

关系的视角：片面应试体制下学生的地位分化

——一项微观社会学的研究

周序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是在片面应试体制下导致学生地位分化的两股主要力量。在利益关系驱动下,教师的教学内容会围绕学校设置的升学“目标线”来组织。只有学习成绩在“目标线”附近的学生,在教学中才可能获得更多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因而,“片面应试”体制下的课堂教学并非都是“陪优生读书”,优生也可能沦为其他学生的陪读。而在亲密关系驱动下,优生比差生能够获得更多的课外答疑和辅导机会。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组成一种交错格局,往往导致同一个学生在课堂内外有着不同的地位。

关键词:片面应试;利益关系;亲密关系;学生地位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4-0075-06

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一直承担着为高等学校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任务,也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机制的身份,以及其蕴含的“图腾”^[1]意义,对整个基础教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以对高中阶段教育的影响最为显著。面对来自高考的压力,不同学校、教师和学生都纷纷围绕考试内容和分值来对知识、教师和学生不断归类并进行应试规训,这首先导致了学校组织地位的逐渐分化^[2],同时也造成了教师地位的分化,诸如“高三教师”、“高考名师”等称号就是部分“地位较高”的教师的身份象征。但对高考升学率的片面追求是否也会导致学生地位的分化呢?目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都是一些“差生陪优生读书”等经验性的看法,缺乏理性的讨论。因此,本文拟通过实证调研,揭示在片面应试体制当中,教师在教学内容选择、组织、教授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策略,以及其背后体现出来的学生地位差异。

一、文献评述

目前很多关于学生地位分层的研究都基于布迪

厄的理论展开。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决定了学生的阶级分化^[3]。有学者根据布迪厄的理论专门探讨了班级内部学生地位的分化,认为在班级内部存在学生权力地位存在垂直分层和“声望”的差异,表现为班级干部和“声望”较好的学生处于优势地位,其他学生则处于劣势地位^[4]。还有人认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是一种精英模式的教育,即以培养、选拔社会精英为目标”,导致“学生群体也呈现金字塔结构,只有少部分学生位于顶端,对大部分学生形成压制”^[5]。这类研究中关于学生地位的认识,大都是从学生的社会阶层地位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并未将课堂教学作为影响学生地位的一个因素来进行分析。

更多的学者则是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班级地位相结合进行考量。纳什认为,在日常的班级生活当中,儿童从小学起就开始经历了“优生”和“差生”的筛选。在儿童进入学校的8天之内,便已经被根据学习成绩的高低和教师的排列来加以筛选了^[6]。帕森斯则指出,中学学生群体地位的分层,“是学校里的成就等级和社会上成年人分层体系之间的桥梁”^[7],

收稿日期:2014-02-06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高考统摄下课堂教学的微观社会学机制研究”[2013C032]

作者简介:周序(1983-),男,四川泸州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

因而学生的地位总是与其学业成就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沿着帕森斯的思路,有学者研究发现,不同地位的学生,其学习成绩存在着显著差异^[8]。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学生在班级里的地位与他们语文成绩以及数学成绩的关系,指出:在地位较高的学生群体当中,语文、数学成绩较好的学生所占比例也相对较大^[9]。因而,学生学业成绩的差异既可以看做是学生地位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造成学生地位分化的一个主要因素。

古德与布罗菲认为,成绩差异导致的学生地位分化,与教师的期望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教师主要是根据学生的成绩差异来对他们进行筛选,并据此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10]。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学业成就就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类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11]。这些研究揭示出,教师的行为和态度是影响学生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并未考虑到考试的压力对教师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在当前“片面应试”的大环境中,中国教育所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模式,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区隔是基础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12]。类似的特征同时也出现在“片面应试”的课堂教学当中,即:同样具有升学的诉求和愿望,但不同学生在课堂中获得的有效教学信息具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在学校中表现出不同的地位。因此,对学生地位的研究必须放置于“片面应试”这一特定的考试文化背景中去理解。这就有必要在课堂教学这一实践场域中,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在同一个课堂当中,不同学生获得不一样的教学信息?

二、研究框架:关系的视角

在“片面应试”的大环境中,有两股相互作用的力量共同构成了影响教师课堂教学的外部因素:一是学校的不断市场化和功利化,升学率的高低成为学校能够获得多少办学经费和招徕生源的重要指标;二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师是否会对某些学生进行倾向性的照顾。

在师生之间,除了教育与被教育关系、教学相长关系、互助合作关系等教育性关系,还有两种关系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在“片面应试”体制下,“学校表面上是一个教学机构,实际上却一直从事着用学生的分数交换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13]。因而,师生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关系。随着市场介入教育领域,升学率和学校利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市场以“利润”作为调节行为的杠杆,而带来利润的最有效方式即满足顾客的需求。在教育中,作为“顾客”的学生,其最大的

需求则是升学,较高的高考分数则是其升学的保障。而教师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声誉还是物质奖励,都是和学生的高考分数绑定在一起的,因而在追求分数这一问题上,师生双方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次,教师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也绝不是唯利是图。教师和学生之间同时也存在着亲密关系。就如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每一位教师对不同的学生也都有不同的喜爱程度。即便是在“紧张备考”的状态下,这种亲密关系也会给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态度、频度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

无论是利益关系还是亲密关系,由于教师在学校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无论在课内还是课外,教师都可以主动地根据自身的利益和与学生之间的亲疏远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导致学生地位的分化。

三、研究方法:案例研究

本文以四川省L市的一所高中为个案,试图揭示在“片面应试”体制下,师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如何对教师的教学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学生地位分化。

出于匿名和美感考虑,笔者将这所学校称为“莲花池中学”。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这是一所“非重点”的中学,长期保持着狠抓“应试”的传统,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其次,无论是利益关系还是亲密关系,都不止受到“应试”的影响,更多的还受到学生所属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影响,因而在一所学生背景较为复杂的学校进行研究,很难判断出哪些属于“应试”造成的学生地位分化。而在莲花池中学,虽然其地处城区,但由于L市的优质生源基本上都流到了市一中,因而莲花池中学的学生基本上来自L市农村或者市外农村,学生家庭背景简单且较为单一,更容易分辨出由于“片面应试”造成的学生地位分化。

本文所说的“地位”不是指学生手握的权力或在班级内部的号召力,而是指其在学校当中可以得到老师的照顾和帮助的多少。“地位”是一个很难测量的东西,需要通过其他指标来衡量。考虑到不同地位的学生,从老师那里获取的对自身有用的学习信息有所差别,因而本研究主要依靠学生获得的信息多少来判断其地位高低。如果学生获得的对自身学习有益的信息多,则说明其地位高;反之则说明其地位低。

笔者在莲花池中学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工作,并全面参与到高三年级某班的班级管理、教学、学生心理辅导和考试等工作当中。期间,在高三(1)、(3)班共随堂听课42节,其中,高三(1)班是重点班,

高三(3)班是普通班。同时,通过观察法、访谈法、文本资料搜集来判断不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能够获得的信息量大小,据此推测不同班级学生的地位分化情况。

四、研究发现

在文理分科后,莲花池中学将学生按照成绩高低分别编入“重点班”和“普通班”,使一个班级内部学生的成绩相对均衡,方便教学工作的开展,同时根据不同班级学生的成绩,“预测”每个班高考的分数状况,从而为每个班级定出“高考”指标。对教师而言,“指标”是一个无形的鞭策,“指标”的达成度与每位老师的生活状态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因而教师们不得不重视。在研究期间,高三(1)班分到了38个“三本线”指标,其中包含7个“重本线”指标,甚至还有1个“冲击北清线”指标;而高三(3)班则只有13个“三本线”指标,没有“重本线”指标。在升学率统摄下,莲花池中学的教学工作便围绕着这些指标进行,而为了更好地达成目标,在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的作用下,不同学生从老师那里得到的照顾和帮助便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1.在利益关系驱动下,教师的教学内容会围绕学校设置的“目标线”来组织。学习成绩在“目标线”附近的学生,在教学中可能获得更多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1)重点班的学生地位分化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重点班,教师的教学难度并不会特别高,而是主要适合班上中等学生的水平,班上排名前三位的学生经常利用上课时间自行练题或者做作业,而授课教师并不予以干涉,优生只有偶尔时听课,与教师互动更多的是中等生,差生则几乎不听课。

高三(1)班的班主任老师告诉笔者:学校给我安排的指标是重点线上7个,录取线上38个。只要完成了这两个指标,就算合格,就有奖金,完不成就要扣钱。那么怎么教这些学生呢?打个比方说,重点线是500分,三本线是300分,那么老师要重点照顾的,就是平时考试成绩在500分上下和300分上下这两个分数段的学生。目的是确保这些在“线左右”的学生尽可能地都能上线。所以讲的题目、卷子的难度就要适合这两类学生。

因此,从利益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在重点班级,教师为了完成学校划定的“指标”,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倾向于设置两类教学内容,一类是适合那些平时考试分数在“重点线”附近的学生内容,另一类是适合平时考试分数在“三本线”附近的

学生的内容。这些教学内容对差生而言过难,对优生来说则嫌简单,但却适合成绩中等的学生学习,以帮助他们能够在高考的时候上重本线或三本线。

“中等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的覆盖范围比较广,从三本线以下到重本线以上的学生都有。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这一群体的教学也是分化的。笔者记录了高三(1)班数学教师在教学中的一段引导性的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这节课我讲的题比较难,要成绩好点的学生才能完全听懂。但是其他同学是不是听不懂就不听了呢?不是。因为再难的题,都是有步骤分的。你听不懂全部,听懂前面两个步骤,就能拿到这两步的步骤分了。所以大家都要竖着耳朵听,听懂多少算多少。

这样,“中等生”在教学中便被分化为两个群体,肩负着达到“重本线”指标这一责任的学生被要求全部听懂,而那些成绩在“三本线”左右的学生则被要求尽可能多拿“步骤分”。不过,被寄望于“冲击北清线”指标的那个学生则始终没有听课,而是在自行做题——对他而言,这节课老师讲的这些题目,依然太过简单。在莲花池中学,“北清线”属于奖励性质的指标线,即达到了有额外奖励,但不作为考核教师的硬性指标,所以高三(1)班的教师在这条线上并未花费太多精力。

但是,作为考核指标的“重本线”和“三本线”却能带给教师巨大压力。过难的教学内容只适合个别优生,但优生毕竟只是少数,他们的分数再高,也无法帮助全班“重本率”的提高;太过简单的内容只适合差生,即便能够略微提高其高考分数,但也很难提高到“三本线”以上,同样无助于全班“升学率”的提升。因而在教学中讲授过难或者过易的内容,都不符合教师的利益,只有讲中等难度的内容才能实现教师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高三(1)班的任课教师基本上都围绕“重本线”和“三本线”这两条分数线来组织各自的教学内容。但中等难度的内容并不符合优生和差生的水平,对他们不具备针对性,因而只有中等生能够从教师的教学中获得更多适合自身的教学信息,这样,在重点班的课堂中就出现了学生地位的分化:中等生成为“重点班”课堂教学中地位最高的群体,优生和差生则沦为“陪读”。这种情况并非个案,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有人研究了湖北省的“县中”教育模式,发现:教师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其实还是最大多数的中等生,所谓‘抓中间,带两头’”^[14]。

(2)普通班的学生地位分化 普通班的情况与重点班有所不同。在随堂听课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普通班的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基本上是针对班级排名靠

前的学生进行教学,而对中等生则是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也不强求,至于差生,甚至允许他们趴在课桌上睡觉。

高三(3)班的班主任告诉笔者:

这些学生平时学习习惯一点都不好,成绩也差,你看他们上课的时候,就前面几个在听课,后面趴着睡觉的一大片。学校给我们班的是13个上线的指标,是所有平行班中最多的一个。还有些平行班只有7个指标。从一诊考试的情况来看,(我们班)上线的有4个,二模是7个,应该说前面6个都还是比较稳定的,高考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第7名二模的时候有点超常发挥,不一定稳当,再后面有几个在线后面一点点的,再后面那些呢希望都不太大。所以现在在我要求那些科任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抓第7到十几名那几个学生,只要把他们的分数提上去了,今年的指标就完成了。

可见,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在普通班,由于只有排名靠前的“优生”才有可能考上“三本”,因而教师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然会按照班上优生的水平来设置教学内容的难度,以最大可能地帮助班上的优生都能在高考中达到“三本”线以上。如果教学内容过难,则班上没有人能听懂,过于简单,“这些内容优生基本上都掌握了,听了对他们来说没有用,差生平时根本就不学,如果都这个时候了还要给他们补基础,一方面他们也不听,另一方面前面那些同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反而影响考试成绩。所以对于后面那些同学,只要他们上课的时候不捣乱,不影响那几个前面的学生听课,我就满足了。”

这样,在普通班的课堂中就出现了另一种学生地位的分化:优生能够从教师的教学中获得更多对自己有所帮助的信息,而中等生和差生均沦为“陪读”。

综合重点班和普通班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在“片面应试”的大环境中,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并不是完全由其成绩高低决定,学生能否在课堂中收获更多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主要看的是自己的平时成绩是否正好处于学校划定的“指标线”附近。在课堂教学中,选择优先照顾成绩在“指标线”附近的学生,牺牲其他学生的利益,是在“追求升学率”这一目的统摄下,一线教师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当学生们人人都希望上大学的时候,集中精力帮助那些分数在“重本线”或者“三本线”附近摇摆的学生,不仅符合教师的利益,也能够使自己任教班级有更多的学生考上大学,从而提高班级的“升学率”。因此,我们不能指责老师的这种“厚此薄彼”的教学方式是“不负责任”的,更不能说是“不道德”的,而只能

说是“升学率”统摄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如果将学生课堂中收获的适合自身水平的信息由多到少划分出一个等级序列,那么平时成绩在“指标线”附近的学生收获的信息无疑是最多的,因而这些学生成为课堂教学中的“优势群体”,而其他学生则沦为“弱势群体”。

2. 在亲密关系驱动下,教师在课外给予优生的辅导更多,也更仔细

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并非一一对应。排除家庭和阶层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成绩高的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较为亲密,而成绩差的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则较为疏远。当然这并非绝对情况,不排除个别成绩优秀但个性特异的学生不太讨老师的喜欢,但通常情况下,学习成绩的高低和师生之间的亲密程度呈正相关,教师在和优生沟通交流的时候会更加愉悦,因而从经济学上的快乐原则出发,教师往往更愿意和优生进行交流。正如高三(1)班的数学老师所说:给优生解答疑难的时候心情都不一样,因为他们学习自觉,来问的都是一些难题,我都要认真想想才能给他们讲,而差生就不一样了,问的题目好多都是课上反复讲过的内容,还要来问,多讲几次就烦了。

师生之间亲密关系的差别导致在课堂之外,学生的地位出现另外一种分化。

首先,优生占据了更多的向老师提出疑难并获得解答的机会。以数学课为例,通常在课间十分钟,总会有个别学生将老师“挽留”在讲台上为他们解答题目中的困惑。笔者在3个月的实习过程中,共记录了高三(1)班数学老师在课间向学生解答疑难71人次,其中为成绩排名前十位的学生解答疑难52人次,所占比例达70%以上。此外,在自习课、晚自习时间主动到办公室找老师答疑解惑的也以优生居多。据高三(1)班的数学老师介绍,在自习课时主动到办公室找他解答疑难的大多数都是优生,他们不但提问积极,而且往往问题比较多;高三(3)班的数学老师则表示,只有优生会在课后向她提问,差生几乎从不提问。可见,无论是在重点班还是普通班,优生都垄断了绝大多数课后向老师提问的机会。

其次,教师对不同成绩的学生讲解题目的时候在耐心、仔细程度上也有所差别。仍以数学课为例,高三(1)班数学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这样形容他的数学老师:老师教得很好,他讲课的时候允许我不听,自己做难题,有不会的就课间或者晚自习的时候问他,他给我讲得也很清楚,每次我都会把昨天不会的题目完全搞懂了,然后再做今天的题目。

但是差生对老师的评价却颇有不同。笔者在和高三(1)班学生沟通交流过程中,有8名数学成绩较为靠后的学生认为,他们的数学老师在解答他们的疑难困惑的时候显得缺乏耐心,自己经常听得似懂非懂。高三(1)班的班主任也认为:教师偏爱优生的情况是个普遍现象,在几乎所有老师身上都存在,只不过数学老师那里,对差生缺乏耐心的情况稍微多了些,我也提醒过他一次,但也不好多说。

可见,受亲密关系影响,无论是在提问的次數上,还是获得解答的仔细程度上,优生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可以在课堂教学之外从教师那里获得更多对自己学习有用的信息,从而学生当中表现出另外一种地位分化:优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最为亲密,因而居于强势地位;而差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获得辅导的机会较少,而且教师对其的辅导也存在不够耐心、不够仔细之处,因而居于弱势地位。

3. 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组成一种交错格局,学生是否能够在两种关系中都得到更多照顾,除了要成绩在班上靠前,还必须成绩正好落在学校肯定的某条指标线附近

综合上述两种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组成一种交错格局,而学生在这一格局中所处位置就反映了他们在“片面应试”体制下的地位分化,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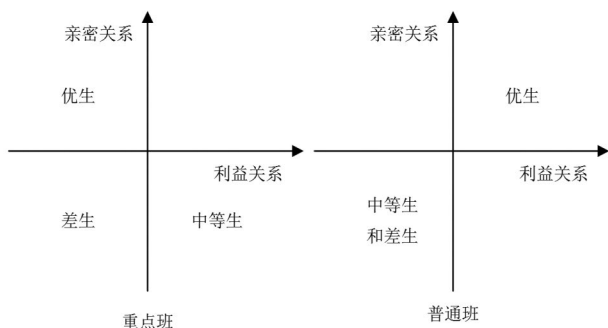


图1 学生在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分化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重点班,优生成绩虽然靠前,在亲密关系上能够得到较多的照顾,但如果其平时成绩已经远远超出作为指标的“重点线”且能保持稳定,那么即便高考的时候分数略有波动,也不至于让教师担心他们的分数会掉到重点线以下,这样,在平时的教学当中,为他们设置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围绕他们来组织课堂教学就不符合教师自身利益了。而中等生的成绩由于正好处在“三本线”或“重本线”附近,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频繁加以督促和规训,以保证他们尽可能多地达到“指标线”以上,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将中等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对象,

便符合教师的利益需求。当然,笔者并不主张机械地看待中等生在教学中的优势地位,而是认为,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平时成绩是否正好落在学校肯定的某条指标线附近,因此,学校划定的“指标线”高低而非学生成绩的高低,是决定学生能否在课堂教学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极端地说,如果学校为莲花池中学高三(1)班划定的指标线是“北清线”,那么可以预计所有教学资源都会围绕班上排名第一的那个学生来运转,从而使这名特优生在教学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其他所有学生都将处于弱势地位。

而在普通班,优生不但在亲密关系当中占据了先天优势,而且由于其成绩正好在“三本线”附近,因此围绕优生组织教学内容便符合教师的利益诉求,因而普通班的优生可以同时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当中都处于优势地位;但中、差生由于平时成绩离“三本线”较远,因而在两种关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

无论在重点班还是普通班,差生都是受到忽视的一个群体。重点班的中等生和普通班的优生作为最符合教师利益的群体,使教师在利益驱动下围绕他们来组织教学,传递着对他们最有利的教学信息;优生作为一个利益行动者,依靠他们和教师之间的亲密关系,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课外辅导机会,这构成了对差生学习资源和机会的无形剥夺。因此,优生并未对差生的发展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中等生也没有在课堂中展现出带动差生的“中坚力量”,反而压制了差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平时成绩远低于学校规定的最低指标线的差生便彻底成为“陪读”。这不仅是极大的教育不公平,同时也致使差生丧失学习兴趣,教师对他们失去教学动力,提供给差生的教育资源被完全浪费。

五、对本研究的讨论

本研究以一所普通高中课内外教学的实际运行为例,集中关注“片面应试”体制下学生在课内外所收获的对自身学习有所帮助的信息量大小,以此来判断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结果发现,利益关系主要在课堂教学环节发生作用,教师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总是倾向于在课堂教学中照顾“优生”,而是倾向于照顾那些平时成绩在学校划定的“指标线”附近的学生。亲密关系主要在课堂教学环节之外发生作用,优生能够在课外从老师的疑难解答中获得更多对自己有帮助的信息。师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亲密关系是导致教师对学生进行差别对待的两个重要因素,对造成学生的地位分化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两

种关系的交织往往导致同一个学生在课堂内外有着不同的地位。

首先,本研究试图扭转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在学校教育当中只有优生才能受到更多的照顾,所有教学资源都向优生倾斜,中等生和差生只能作为优生的陪读。根据本研究结论,优生是否能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更多的关注,要看其成绩是否恰好落在学校划定的某一“指标线”附近。如果某学生的成绩足够优秀,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校划定的指标线,让老师不致担心他在高考时分数会降到该指标线以下,那么教师的教学便不会围绕该生展开,这也导致该生无法在课堂教学中获得足够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学以及课外的答疑来保证分数的稳定和提升。在重点班,优生的地位主要体现在课外,他们凭借和教师之间的亲密关系,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课外答疑机会和更耐心的辅导,再加上自己扎实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自学能力,因此能够保证自己的成绩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并在高考录取中占据优势。但我们不能因为优生能够在课外得到教师更多的偏爱,便认为优生在课内也占据优势地位,这实际上是混淆利益关系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区别;当然我们也不能仅因为优生在录取中的优势,便认为中、差生都是优生的陪读,这其实是将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混同了起来。

其次,学生的地位分化导致不同学生在校期间收获的信息在数量、质量上都是不同的,有的学生被优先照顾,有的学生被牺牲,这显然不符合“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这种“区别对待”自然不是依据“因材施教”的思想,而是出自对效率的追求。教育当然是要追求效率的,但由于在“片面应试”体制下,外在于教育的“升学率”替代了内在的“全面发展”,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几乎唯一指标,因而“升学率”便从教育当中外化出来,成为外在于教育并且控制教育的工具。这个时候,“效率”这一概念便被异化,不再具有教育的韵味,而是成为一个纯粹经济学的概念。显而易见,教师对所教班级的“升学率”的追求,与厂家对商品“合格率”的重视如出一辙。正如厂家将“不合格”产品一律淘汰,以赢得市场声誉一般,教师也选择了牺牲部分学生的利益,以保证可以集中精力来照顾那些成绩在“指标线”附近的学生,从而促进全班“升学率”的提高。“只要必须有优胜劣汰的标准,那么那些遵循经济效益标准的群体就比那些基于非效率标准的群体更有效率”^[15]。

第三,学生地位的分化,导致他们在学校中接受到的教育在时间和质量上都存在差别。从教育公平

的理念出发,教师应该努力缩小这种差别。但是一方面,在实践当中,学校并未努力缩小这种不公平,反而通过各种“指标线”的划定,为这种不公平的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出于对“精神快乐”的追求,会在课外给予优生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精神快乐对于人类行为的这种充要性特点,事实上将成为我们几乎解释所有人类行为和寻找几乎所有社会、经济对策的根本性准则”^[16]。这一准则在教育实践中的结果是优生和教师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加紧密,而中、差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则相对疏远。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没有为教育公平做出努力,因而在“片面应试”的体制下,教育公平便往往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参考文献:

- [1]张东娇.最后的图腾——中国高中教育价值取向与学校特色发展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 [2]陈彬莉.升学率驱动下的学校组织地位分化——以W县高中教育为例[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1):94-102.
- [3]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害[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4]朱慧欣.班级内学生地位分化及对策探究[J].教学与管理,2009(9):24-26.
- [5]林玲.底层家长与学校教育关系之解构与重建[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
- [6]Nash R.Pupils' Expectations for Their Teachers[J].Research in Education,1974(12):47-61.
- [7]塔尔科特·帕森斯.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班级:它在美国社会中的某些功能[C]//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8]李德显.课堂秩序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9]刘云杉,等.小学班级中学生角色因素的相关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5(3):37-40.
- [10]L.Good & Jere.E.Brophy.Looking in Classrooms[M].London:Addison Wesley Longman,1997.
- [11]孙建萍.班级中的学生地位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2):70-71.
- [12]刘精明.扩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4):142-147.
- [13]周序.应试主义教育的规训及其逻辑[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2.
- [14]周颖.“县中”模式的特点及成因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
- [15]汪丁丁.教育的问题[J].读书,2007(11):40.
- [16]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下转第84页)

认其在男女情爱性别差异上的“经学”的位置。再如鲁迅的《孔乙己》在细节意义上的丰富性，细节与细节之间构成的意义的生成性，让我们在社会转型的当下，看到了社会转型时代，一种文化逐渐没落逐渐边缘化时，这种文化的坚守者的悲凉。其实，古今中外经典所讲述的大千世界万象人生，就在阅读者的身边，而不是远离阅读者的经院之物。

自然，以上只是举其大要者而言。其实，选择何种文本进行细读，因人在性情、文化水准、具体人生情境、心绪、感知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个个不同，但也正是这个个不同，使阅读者的作为“这一个”的“个体”得以走向成熟，而在细读时培养的“这一个”与时代、社会等等的“对话”能力，就是他们走向这一成熟的桥梁。

四、结 语

我们认为，在当前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从文本细读出发，有利于打破原有的僵硬的理念框架，培养一代人个体性的审美感知能力，培养一代人健全的现代人格。文本细读，是语

文教育顺应时代，回归其本体的有效的突破口，是语文教学的密码，值得为语文学界的同仁所重视所探讨。特此提出，就教于先进。

参考文献：

- [1]刘 纳.在学术论文的大生产运动中想起李健吾[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86-88.
- [2]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鲁枢元.文学与生态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 [4]彭小燕.“虚无”四重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185-198.
- [5]罗 岗.读出文本与读入文本[J].文学评论,2002,(2):85-86.
- [6]秦朝晖.奇辱奇志凝奇文[J].名作欣赏,2010(10):9-11.

Textual Close Reading: The Key of Chinese Teaching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Education Situation and Outlet Exploration

QIN Zhao-hui¹, FU Shu-hua²

(1. Basic Department,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Yuci, Shanxi 030619, China;

2. Institute of Humanit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Yuci,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Supposing that the most defective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College Chinese is a double failure in humanity and instrumentality, resulted of preset doctrines, over-dependence on the technique and conceptual transplantation, so that it strays away from the thing proper, this essay argues for the textual close reading as an effective way to overcome the defects, develops the strategy of close reading at the levels of key expressions, symptoms and hiatuses in the text, and the deep cultural poetics, and exposes the choic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reader, times, and canon.

Key words: textual close reading;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education

(上接第 80 页)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Discrimination of Students under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System

—A Micro-sociological Research

ZHOU X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 of interest and affect are two major forces which discriminate students under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Motivated by interest relations, teaching contents tend to satisfy and help those who are surrounding the marks fixed by school. Thus, students who are nearly likely to achieve or fail the aims are the groups receiving more attention and useful information in teaching. Therefore, the teaching is not always a site in which best students can be cared about while others are just learning companies, but a place best students are likely become the companies for important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motivated by the affect relations, best students can get more opportunities of asking questions and guidance after class than low grade learners. The interest relations and affect relations are entwined, which makes the same learner be in different rank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Key words: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nterest relations; affect relations; students' ranks